

福建戴云山区村落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探讨 ——以永泰县珠峰村为例^{*}

◎方良朱 卓 竞（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传入我国已有三十余年，以往我国建立的生态博物馆大都显现出以少数民族及他们的文化遗产为保护对象、绝大多数建立在西部偏远地区的两大特点。随着我国生态博物馆理念与实践的进步，过去不被重视的东部汉族聚居区域成为了时下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新沃土。福建戴云山区一带历史文化悠久，散落着以珠峰村为代表的众多保存完好且具有闽中山民文化特色的汉族古村落，这里不仅具备建设一座生态博物馆所必需的客观条件，而且生态博物馆的建成还将对当地古村落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 戴云山区 珠峰村

一、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

生态博物馆是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率先兴起的一种博物馆的新类型，它与传统博物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再以藏品作为博物馆工作的核心，而是以整个社区或族群作为其展示和保护的对象，社区或族群中所含的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生态博物馆的组成部分，保存这些文化遗产的原生性、整体性、真实性是其重要的理念。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1995年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在贵州六枝特区隆戛乡的深山上建立，标志着从西方传入的生态博物馆理念在中国正式生根发芽。二十多年过去，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呈现出两个富有本土化风格的特点：第一，选址一般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村落，展示和保护的对象大多数为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物质遗产和民俗文化；第

二，全国生态博物馆的分布极不均衡，“西多东少”。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来自于“六枝传统”，因为落后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了相对丰富和古老的物质文化遗存及民俗习惯，率先在这些地区建立生态博物馆是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原生性”理念的践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区域性不均衡的客观事实，西部比东部地区工业化程度落后很多，这恰使得西部山区遗存了许多仍保留着古朴民族风俗的村落和族群，因此，大多数的生态博物馆在西部建立也是可以想见的。

为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事业在我国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推行，我们要将眼光投射在以往未被关注的区域和族群。2009年建成的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就开创了在东部地区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先例，这是对我国生态博物馆文化内涵进行拓展的大胆尝试^[1]。同样位处东部的福建戴云山区，有着很多具有闽中文化特色的村落。这里的居民虽属于汉族，但数百

^{*} 本文得到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资助（项目经费代码0640-Y03101）。

年来长期居住于这一山区，他们的物质文化和产业生活已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山民社会形态，这些族群留下的建筑、文书、风俗等文化遗产也同样需要我们的保护和保存。2017年10月，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十余人前往福建永泰县从事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搜集活动，笔者即被分配至珠峰村进行考察，结合这次考察的实际情况，本文拟以珠峰村为例，试探讨在福建戴云山区众多富有山民文化特色的村落中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

二、珠峰村建成生态博物馆的优势

珠峰村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盖洋乡西北部，距乡政府19公里，整个村庄坐落于戴云山脉东北延伸部的群山之中，平均海拔约700米，周围层峦叠嶂，风景秀丽。因山路险峻难行，村落与外界交流并不频繁，整体保留了较好的原生态性。村寨基本建在整座山的中上部，有保存较好的屋厝四十余座，尤以始建于清代道光时期宏伟壮观的钦察寨远近闻名，反映了闽中山区独特的房屋建筑特色。珠峰村居民以谢氏宗族为主，他们在明代洪熙年间就已在此地居住，目前全村保藏有约5000件反映明清至民国时期谢氏宗族在本地及周边区域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文书，是研究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民间文献。

该村的经济产业模式较为单一，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竹林经营、菜籽油生产、银杏果贩卖和红菇采摘等。每年深秋，会有不少的外地人来此欣赏银杏落叶的美景，购买银杏果。

珠峰村建成生态博物馆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



图一 珠峰村的自然环境

下四个方面：

（一）自然环境

珠峰村坐落于山腰处，山中因种植大片竹林，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郁郁葱葱，绿意盎然。村中还有三十多株树龄达六七百年的银杏树，深秋时节，银杏树叶开始泛黄，整个村落便被金黄的银杏落叶映衬得古色古香（图一、二）。珠峰村远离城市，基本没有工业生产和光电污染，因而空气质量极好，在无云的夜晚，肉眼可见漫天灿烂的星河。村中通往盖洋乡有一条近年才修建的蜿蜒山路，平时村民多骑摩托车往来于村镇之间，若逢下雨则部分路段泥泞难行，正因如此该村的自然环境没有被外界过多破坏，保留了较强的原生态性，具备了作为生态



图二 珠峰村航拍图（摄影：刘焯）



图三 钦察寨修缮航拍图（摄影：刘焘）

博物馆的必要条件。

（二）村落建筑

珠峰村几乎没有现代建筑，房屋基本为土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房子一层多为厨房或厕所，有木制楼梯通往二层，二层为起居室，上楼要先脱鞋，着拖鞋或光脚进入二层。这类建筑古朴大方，极富特色，为闽中山区村落建筑的代表。

全村最宏伟的建筑是钦察寨。该寨平面呈船型，以石为基，整体为土木结构，寨墙高筑，建筑规模宏伟（图三）。大寨五厅十扇，共三百七十二间房，前门后埕、花台阳沟、书斋丁厝、围墙炮台一应俱全，不仅具备良好的防御能力，还能提供齐全的生活设施，能够容纳数百人同时居住。这座大寨始建于道光十二年（1832），历经22年才建造完成，它的建造者是现在谢氏宗族的祖先钦察公。根据《珠峰山兜祠谱志》记载，钦察公早年发迹后衣锦还乡，因过于富裕被土匪盯上，土匪打伤钦察公并劫掠了大量财物，这使得钦察公意识到必须建立一座坚固的庄寨来护卫宗族安全。他随即选择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地点作为宅基，招募工匠，购买材料以建立庄寨，他的义举得到了谢氏宗族的广泛支持，他们通过地坪交换等方式，使钦察公获得了足够的土地建造庄寨。庄寨建成后，谢氏宗族居于寨中，寨内人口鼎盛时近千人，直至清末民初，庄寨不能承受暴增的

人口，一些寨民便开始向寨外搬迁。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寨中已基本没有住户，后来大寨因年久失修，建筑逐渐破落，甚至有近一半的房子被拆了变卖木材，直到2016年才开始重新修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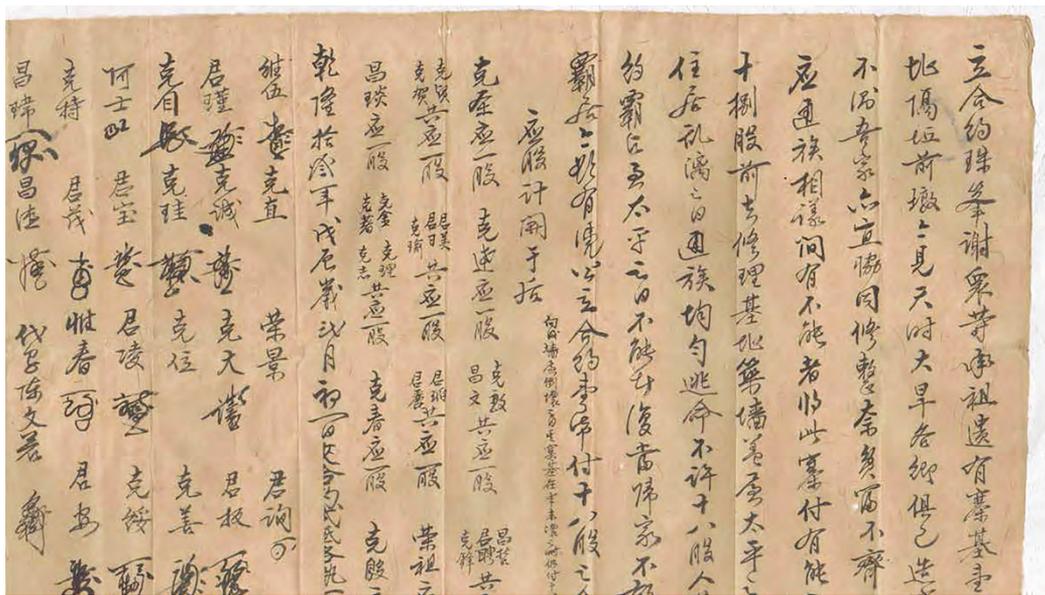
以珠峰村钦察寨为代表的庄寨在戴云山区并不

乏见，这种防御与生活功能兼备的大规模建筑群，彰显着该地区山民社会的本质。珠峰大寨虽已破败，但主体建筑仍存，目前进行的修缮工作也严格按照残存的建筑风格进行，力求达到“修旧如旧”的要求。总的来说，珠峰村的建筑独具特色，形式古朴，文化内涵丰富，不仅反映了当地居民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建筑理念，还体现了聚族而居，共同生活和抵御外来侵入者的朴素的山民价值观。以往，村民因世代居住于此，这些在我们外人看来富有内涵和特色的建筑，对他们而言只是挡风遮雨的日常生活场所，所以他们对这些建筑的保护意识也就相对薄弱。如果在珠峰村建立一座生态博物馆，一方面让村民意识到他们世代所居的房屋的特殊价值，将有利于村落建筑群的保护；另一方面可让游客近距离参观游览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领略现实版的世外桃源风采，这即是对生态博物馆倡导者之一——法国学者希微贺阐述的生态博物馆定义的最好回应^[2]。

（三）文书与民俗

珠峰村历史文化气息浓厚，保存着丰富的民间历史文献资料和民俗习惯。本次考察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対从村民处收集来的各类文书进行录文，以期经过后期的释读，了解该村自明末清初以来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信息。目前所收录到的珠峰谢氏

各户文书总数达到5000余件,既有原本置于庄寨厅堂之中集体保管的公共文书,也有各户家中世代流传的私人文书。从生成时段来看,明末到新中国成立后都有一定数量的各类文书,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珠峰谢氏宗族的发展史。从文书的类



图四 珠峰谢众合股修理庄寨约 [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

型来看,包括族谱、契约、阉书(即分家时所立的契约)、日用杂书、科仪本等,从社会经济、宗族特征和文化信仰等多个层面展现了珠峰地区的历史面貌(图四)。珠峰村之所以会有数量如此巨大的文书得以流传下来,这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因为这些祖先流传下来的文书在今天的珠峰村依然发挥着作用,比如谢氏族人需要通过族谱记载家族历史,通过契约确立产权归属,通过科仪本举行宗教仪式等;其次是因为本村居民住宅多为古屋旧厝,村中几乎没有完全重建的房屋,因此有一些现在已经很少用到的文书可以一直保存在老宅之中,没有在拆屋搬家的过程中遗失或破坏;第三是珠峰谢氏族人对本地的历史文化非常重视,他们普遍将家中流传下来的各类文书视作珍宝,使这些文书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从这些方面看,珠峰村的文书体现了很强的原生性,不仅其本身承载了历史文化、经济活动、民间风俗等鲜活讯息,它良好的保存状态更显现出珠峰村整体的原生态性和村民对自身文化民俗的重视,这一点恰巧是建设一座生态博物馆不可或缺的元素。近年来,珠峰村新建了文书陈列室,说明领导层已经重视到这类反映当地山民社会的文化遗产,这一举动也为珠峰村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构想提供了先行基础。

除了保存丰富的文书外,珠峰村还保留了元宵迎神等热闹的民俗活动。每逢正月十五临近,全村各户都会准备好游神活动的祭品,进行请神活动,所请的神灵包括本地信仰的广泽尊王、泗州佛、卢公、三位圣母和关圣帝君等,这类风俗活动体现了这一带山区村落传承已久的文化渊源和民俗特色。遗憾的是,近年来这样的风俗活动在当地已日渐式微,其原因也不难料想,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仅靠内部的世代传承,而不加以外部的鼓励和保护,本身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甚至消失。如果在此地建立生态博物馆,不仅是保护这些风俗活动的有效途径,还是向外界展现山民多彩风俗习惯的良好机会。

(四) 物色特产

珠峰村的居民主要为中老年人,青壮年多赴福州、永泰等地务工,村内的产业模式比较单一,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竹林经营,包括向商人贩卖成竹和采摘竹笋加工成笋干出售。银杏树是该村的一大特色景观,全村共有银杏树三十多株,每年深秋银杏叶泛黄之时,会有不少外地人前来欣赏落叶美景,顺便购买银杏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林地区特有的物产不仅可以作为吸引游人前来的理由,也可进一步开发成兼具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供游人购买,既宣传文化,又创造收益。

综上，珠峰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保存良好的土木建筑，内涵丰富的文化风俗和独具特色的物产资源，这些自然和文化遗存彼此相互融合，富有原生性、整体性和真实性，具备了建设一座反映闽中地区山民社会群体的生态博物馆的必要条件。

三、建设生态博物馆——保护和发展村落的一种途径

目前，我国采用了多种模式并行的方式对传统村落或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比如评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和生态博物馆等。这几种模式在目的上都是对物质遗产和非遗文化的保护，但在定义上却有着各自的倾向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候选应是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传统村镇；文化生态区强调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区域的整体性保护^[3]；民族生态文化村和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几近相同，都强调了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但民族生态文化村基本建立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的选址则不限于此。

显然，通过以上几种村落保护模式的对比和前文对珠峰村情况的分析，采用生态博物馆的方式来对珠峰村进行保护和发展是最符合客观实际的一项选择。此外，中国的传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宗族制度盛行，自治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权威甚至超过官方^[4]。珠峰村大部分村民都属于谢氏宗族，其内部本身就有一套成体系的自治制度，这与生态博物馆强调的社区与居民的高度参与理念不谋而合，即将原本村子内部的管理制度与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机制相结合，调动村民的力量来对生态博物馆进行日常运作和维护，最大程度上保留村落的原生态性，使村民成为博物馆的主人。

总之，在以珠峰村为代表的一群散落于戴云山区富有山民社会特征的村落中建立生态博物馆，不失为对其保护和发展的一项重要途径。笔者在此仅是根据在村落实际考察的情况和对生态博物馆理念

的解读来讨论这一可行性。事实上，建设一座生态博物馆需要考虑的层面还有很多：除具体建设规划和审批程序外，一个社区、一个村寨在社会迅速发展、居民生活不断更新之中，怎样使其生活方式和文化“定格”、停止在一种状态^[5]？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平衡保护文化和发展经济的关系？怎样在建设中避免走一些生态博物馆脱离其理念的老路^[6]？这些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去不断探索。（本文在实地田野调查中受到了东南乡村建设公司张明珍工程师及珠峰村领导的帮助。谨致谢忱！）

注释：

[1] 赵宇：《浅谈对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的认识及相关思考》，《中国民族博览》2017年第2期，第235页。

[2] 希微贺对生态博物馆的定义是：“生态博物馆是地方人民关注自己的一面镜子，以寻求把他们祖祖辈辈在各个生态领域获得的成就作出解释。它也是当地居民让参观者拿着的一面镜子以便更好地了解当地的产业、生活习惯和共同崇敬的事物。”参见甄朔南、沈永华主编：《现代博物馆基础知识回答》，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2000年，第9页。

[3] 刘万春：《论生态博物馆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作用》，南京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第23页。

[4] 唐孝祥、王东：《以生态博物馆为导向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06页。

[5] 王宏均：《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6] 如以贵州六枝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为例，该馆虽遵照生态博物馆对文化遗产整体、动态、当地保护的理念创办，但村民并未“成为主人”，而是在建设初期由政府作为“文化代理”接管。参见金露：《生态博物馆理念、功能转变及中国实践》，《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49页。